



王家范：我就是个教书匠

■文/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硕士 王婧娅

或许你曾期待过这样的历史老师：他让大家把课本上用来应付考试的知识标注好，然后便依着这节课的主要内容，讲起生动活泼的历史故事。讲到法国大革命，他还会高唱一首《马赛曲》，音色醇厚，余音绕梁。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王家范先生就遇到过这样一位历史老师。“这辈子能做个他这样的历史老师就够了”的念头一闪而过，却在以后的人生中占据了四十年时光。如今已满头银发的他回首往事，将“教授”、“学者”、“专家”等头衔挥手拂去，给自己找了个满意的定位：“我就是个教书匠。”

历史教学：四十载讲坛人生

1957年，19岁的王家范，风华正茂，欢欣鼓舞地跨进华东师大的校园，自中学时代萌发的历史研究梦终于要在这里变为现实。四年求学，孜孜不倦，毕业后留校任教。1963年，他完成从学生到助教的身份转变不到三年，就站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台，这一站就是四十年。四十载讲台人生，传道授业解惑，全心全意，无怨无悔。

“怕再也没有像司马光这样的主编了”

王家范逐年过渡式地从系主任谢天佑先生手中接过中国通史课的教鞭，第一年讲三分之一，第二年讲二分之一，第三年开始就独挑大梁。从此，他大半辈子的精力都花在了教学上。高校教师大多注重自己的学术研究，轻视教学任务，王家范截然不同。他给本科生上中国通史课程，费尽心思写讲稿，而且每年的讲稿都不一样，屡屡做出修订。1990年应系里的要求，他又给研究生开设一门“中国历史通论”。现在广为人知的《中国历史通论》一书即为该课程的讲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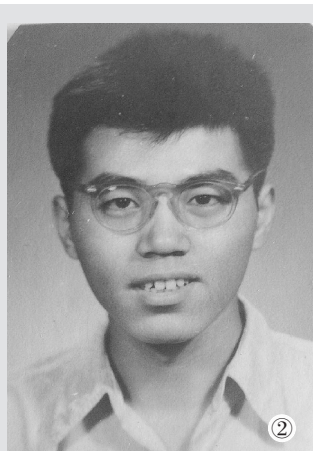
他常常在不同文章中强调张荫麟的一句话：“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写通史要求综合、古今贯通，在他看来，通史之难，就在必须建立在专门史、断代史的基础上。近几十年，断代史、专门史发展出如此之多的新成果，“若要写新的通史，不吸收这些新成果肯定不对，吸收的话又太多。”王家范说起这个话题，话匣子便打开了。“要把局部的变为整体的，又需要一番功夫。这两番功夫都需用力很深。”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读书之人百，通者无一焉。”一阵沉默后，王家范感叹，以后不见得有人愿意写通史了。

对于如今通史编写多为“包干制”分卷形式的现状，王家范亦喜亦忧。喜的是政府愿意出大钱支持，仍有人愿意做写通史这样的“傻活”；忧的是时下急功近利之风弥漫，“怕再也没有像司马光这样的主编了！”在他看来，《资治通鉴》一书的巨大成就不仅在于每册的分主编与长编功力深厚，学识渊博，更在于总编司马光高瞻远瞩，“把全部都打通一遍”，将几百万字压缩成一二十万字。“你说现在可能吗？不可能的，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人了。”无奈、失落、遗憾、惭愧，五味杂陈的王家范自问自答中似乎饱含着无限意味。

“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你也读出自己的味道来了”

对于怎样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王家范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与理念。比如中国通史的教学，他从每一时段挑出典型的人和事出来，从史料上下工夫，具体而微地分析，然后再从宏观的角度拉出一条线索来。有点有面，推动学生更深入地思考。

当时有人对《中国历史通论》颇不以为然：“你讲张三怎么说李四怎么说干什么，你只要说自己怎么说就行了？”对此，王家范坚持一种开放的形式，以教学为目的，以学生为受众，引用大量各种各样的说



①王家范讲课时激情万丈
②1961年大学毕业证照片
③2015年在沙漠玩手机
④2013年在松江参加研讨会

法，让读者从问题中形成自己的看法，不急于马上得出结论。他始终主张上课应该举一反三，重在展示过程和方法，这对培养学生独立学术精神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若你对我的说法有疑问或不满意，我会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你也读出自己的味道来了！”《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出版，十年磨一剑，却是四十年的实践与参悟。有人夸奖说是当今的《读通鉴论》，有人点评说是用了“历史唯物论”。“他们都错了，一个吹捧，一个没读懂”，王家范对记者说。他认为自己最大的贡献是突破了“自古就是大一统”的说法，拉出了部落时代、封建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的历史脉络。

王家范并没有在别人的掌声中迷失和自得，他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着非常清醒而全面的认识。他不仅在课堂上告诫学生要独立思考，更是以自己的学术实践言传身教，润物细无声。

“历史感受过程也是一种思维体操，让你学会思考”

编写教材，高瞻远瞩，融会贯通；教学理念，举一反三，独立思考。此外，王家范还十分注重教学艺术，常常将知识以自身的学术功力、人格魅力艺术化地呈现出来。有一年他给中文系学生开课，在课上问坐在下面的同学何谓历史，看着大家略显茫然的神色，他答道：“诸位请看窗外，历史，就是天上的浮云！”诗一般的语言，感性地呈现出对历史本质的思考，一下子引发了学生们对史学的热情。

他主张“快乐历史”，学生们应该从中感受到“智慧的魅力”与历史所带来的快乐。现在有很多学生困惑于“学历史无用”这个问题，王家范认为这其实是个感受与体验问题。历史的确不能给你带来即刻的效益，但读史使人明智。古今形势虽大不相同但道理却是相通的，“这种感受过程也是一种思维体操，让你学得智慧，学会思考，从而更全面更理性地看待社会和人生。”王家范将这些思考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告诉学生。

现已经是《探索与争鸣》杂志主编的秦维宪深情

回忆了三十年前王家范先生讲王安石变法的场景。那是1980年的初春，草长莺飞，文史楼的某间教室济济一堂，王家范开讲王安石变法，神采飞扬。他首先将王安石变法置于中国历史长河中去观照，与历史上其他改革或改良运动作比较，继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改革的性质。随后，他抛给学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比革命要艰难？紧接着他细致分析了宋仁宗时期的三大社会弊端。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已过，但学生们仍沉浸在北宋历史的氛围中。这时，王家范看着窗外的夕阳，突然激动地说道：“现在下课，大家去吃饭，晚上七点继续上课。”入夜后，灯火通明的教室，王家范先生精神更加奕奕，将整个变法过程的曲折跌宕娓娓道来，高潮环环相扣，不时闪烁出一位历史学者的真知灼见。下课时已是晚上十点。先生点燃一支烟，凝视着台下的学生，目光深邃而意味深长。30年过去，秦维宪仍难以忘怀并将永远记住这样一堂别开生面的历史课。

只要站上讲台，王家范就如鱼得水，神采奕奕。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并非只是艺术性地教学，更是在传播思维体操的智慧，代代莘莘学子回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总能在王家范那深邃而锐利的眼神和历史习得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指引和启悟。

学术研究：做学问全凭“兴趣主义”

王家范自陈一生葆有好奇心，做事全凭“兴趣主义”。想弄明白哪个问题，就去读相关的书，从没想过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然而，一个凭兴趣生活的人是幸福的，一位任兴趣做研究的学者更是幸运的。

“我这个人就是兴趣主义的”

王家范的学术生涯，颇有几番转折。高中时期，承蒙就读于山大中文系同乡学长的无私寄赠，他接触到了《文史哲》杂志。那时候的山大历史系以及著名的“六大教授”，是王家范内心最大的向往。后来由于家境困窘，加上当中学老师的志向，使他最终走入

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他跟随束世徵先生学商周史。随后几年，王家范接替谢天佑先生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学术研究也随他转向“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1978年11月，华东师大历史系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他发表了文革结束以后第一篇真正的论文——《李自成政权的演变》。后来，前辈学者逐渐意识到，农民战争研究真要发展，必须从它的基础——经济入手。谢天佑、漆侠等一批学界主力转向了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次转变，王家范将自己的落脚点找在了自己最熟悉的明清江南领域。

“我这个人就是兴趣主义的。我就想了解江南史是个什么模样，我不想成为江南史专家，我不想写大制作的，我从来就不写大制作。”王家范一再强调自己的“兴趣主义”，几经辗转，他最终的兴趣点在于他所熟悉的江南。1984年到无锡开会，《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论文的思想一经表达就在会上引起了轰动。

王家范曾说自己属虎，骨子里是改不掉的好动不安，才有这样的兴趣转变，才有一个又一个领域的开拓，正如熊十力所说的“大化恒转不止，刹那刹那，生生新新而起。”究其实，兴趣转移中更隐有一条学术研究的科学之道，其中也浓缩了中国历史学界的集体提升和个人的孜孜追求。

“我不是搞这个的，我就是要用”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西方思想理论，王家范始终是以自身兴趣为出发点，凭着好奇心，读自己想读的书，为我所用，做自己喜欢研究。

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王家范说自己四十岁以后才真正从事史学研究。他把十年当二十年来过，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书籍，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囫圇吞枣，一知半解也硬着头皮读下去。他笑言一来是自身的好奇心使然，二来是为了和学生保持同步：“当时大学校园里谈的都是这些书。那些西方理论来了以后觉得很新鲜，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一些东西。过去我们解释的手段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他曾用“此山望见那山高”来理解民国初年西潮涌入对学界的影响：“观察没有深入到一定程度，学者对西方政治或文化，求变逐异的心理作用下，往往容易夸大好感的成分，不少偏执之论。”这又何尝不是七八十年代西方书籍大量涌入时的真实写照？

如今，他认为应当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这种变化；对西方的东西大可不必太过迷信，关键还在我们自己的底子上。外国人当然不可能对中国完全了解，没有实际的体验，往往会使得研究有隔靴搔痒之嫌。但他们对我们的新的启发，有些是我们从来没想过的，这种新的视角也不能一笔抹杀。能够吸纳西方的东西为自己所用，做到了无痕迹，这才是高手。而对于西方一些新方法的引入，王家范在明清江南史研究中更是享受着“拿来主义”，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经济学……

对于别人诟病他不懂外文，他坦然接受：“有人要批评我哪个不对，我肯定承认的。大体上我对西方的书，还是学马列的办法——‘活学活用’，实际上没有对西方思想系统研读，我不是搞这个的，我就是要用。哪几句话我觉得有体验，用到我这里还蛮好，我就用。”

谈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王家范认为实际上自己这一代人骨子里都深受其影响。他从学生时代就认真读过马、恩、毛的著作，不仅是通读，还规定要写心得。他说有通读的底子在，直接接触了他们的文字，长处短处都看得到，就不会形成太偏颇的看法。所以现在经常看到有人对马列有偏离原意的解读，内心还会一晒。

讲到这里，王家范又想起了吕思勉（下转第3版）